

复原的“福寿井”

曹州老城中一直流传有“七十二条街，七十二眼井”的说法。对于七十二条街，菏泽人都比较熟悉。可是对于七十二眼井，当今年轻人就有些陌生，因为老城中的水井大部分早已不存在。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城中的老井却成为难忘的记忆。

曹州老城的七十二眼井，在史书资料中均无记载。现在城中多位老菏泽人证明，七十二眼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因为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多数的水井还存在。但具体是否是七十二数，没得到完全证实。我想这可能是个吉利数，依从七十二条街之说。因为街道是地煞的象征，水井则是其隐身之处。地煞晚间降妖伏魔，白昼要遁入水中则无形。

据城中长久居住的多位老人讲，老城中的每眼井都是有名字的。多数依所处位置特征而命名，例如石马井、石人井、马道井、教场井等。有的依附近人家姓氏而命名，例如焦井、宋井、崔

# 曹州老城的七十二眼井

井、刘井等；有的依据井型特点而命名，例如沟子井、双井、三角井、槐花井等；有的依据周边作坊而命名，例如染坊井、酒泉井、粉坊井、豆坊井等；有的依据人文传说而命名，例如舜井、石人井、孝子井、福寿井等。

由于菏泽老城内地势低洼，雨水和生活用水全部注入坑塘，渗入地下。所以，城内的老井逐渐变为“苦水井”“咸水井”，有的只能洗涤，后来只有少量的井水能食用。因此，城内又出现了职业水夫，用畜力或人力到城外去拉水，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。随着自来水的普及，老井失去了使用价值，加之城中的建设，很多水井被逐渐废弃、填埋而消失，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。可是这七十二眼井，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，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

记得风洲上的重华书院前有个“舜井”，井旁有个舜祠，还有几棵红花槐。传说在“舜耕历山，风雷泽，陶河滨”时期，舜曾驻足风洲，来消夏避暑。后来舜帝南巡，崩于苍梧之野，葬于九嶷山下。娥皇、女英闻讯，悲痛欲绝，乘风南下，路过风洲，泪洒槐花树，槐花顷刻变成红色。于是，后人赋予了红花槐为“妃槐”的美誉，自然与“斑竹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在老城的东南隅，有两眼井一南一北，相距不过五尺，人称“双井”，又名“双龙井”，所处的街叫作“双井街”。两眼井又有“双龙蟠东”之说，一清一浊，一甜一咸。据说，一眼通东海，一眼通黄海。相传宋朝初年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宋太祖赵匡胤昭示天下，加封诸天神明，曹州百姓向龙王庙进贡祭拜。一天，一只青龙和一只黄龙在祀殿上喝得酩酊大醉，跃入天空，左盘右旋，上腾下翻，搅得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，从天而降。下界霎时积水横流，坑河暴涨，田园遭淹没，房屋被冲垮。老百姓呼天唤地，怨声不断。两条龙听到呼声，方才醒悟，心想如此渎职，玉帝定会严惩，一时情急，从天上栽下，落在曹州城中，顿时出现两个深洞，四周积水很快流入洞中，这便

形成了“双井”。

在石人隅首南，原有个石人和“石人井”，井旁还有棵倾斜的大榆树，这里有个“将军救生”的故事。据说在元代，黄河决口，涌进曹州城，城内百姓拼命逃生，有的登上房顶，有的爬上大树，还有很多人被洪水卷走。这时，城南有棵大榆树，树上有三人避水，一位怀揣银两的财主，一位手持宝剑的将军，还有位身背京瓜的老汉。第二天，未见水退，三人都未进食，财主饥饿难耐，盯住老汉的京瓜，要用银两去换，老汉不允，财主伸手去抢，不慎落入水中淹死了。第三天，水还未退，老汉见将军饿的难以支撑，便拿出京瓜，二人分食吃下，将军感激不尽。第四天，眼看大树有些倾斜，将军毅然跳入水中。第五天，大水退去，老汉见树下有个石人，手握宝剑，在支撑着。老汉知道这是将军变的，万分感激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将军的义举，把石人就地安放在石座上，供人祀奉。

现在老城中唯一幸存的一眼井，是“沟子井”，它位于水洼街与北顺城街的交叉处。因井口周围的砌石有很多沟子，所以称其为“沟子井”。井口上的沟子是打水的井绳勒出来的，沟子又多又深，说明打水的人次多，井的历史久远。今日来到井边，见它依然静静的守望在街旁，被四条水泥板封盖着，从缝隙间可以看到井沿上的沟子。北边墙上镶有一块简介牌，是保护者亚生先生的手书：“沟子井以井口圆周有沟得名，并水甘甜爽口，远近皆知，历史悠久，是老城72眼井的唯一幸存。据考证，此井至少建于明代，有500年的历史，是菏泽老城区的历史文化体现，具有文物保护价值。”

青年湖东北岸边，福寿街西，现在有一块石碑和复原古井，名叫“福寿井”。古井为砖砌圆形，井口为石砌方形，为了安全，上面加盖了不锈钢防护罩，空隙间垂直往下可看到水面，但井深令人胆寒。旁边的石碑上刻有“福寿井”三个大字。据传，明天启年间，山东巡抚赵麟莅临曹州，

饮用此井水熬制的豆粥后不禁赞曰：“水美粥佳，福泽百姓，可延年益寿。”时任知州杨湛然将此井冠名为“福寿井”。天启七年，士绅勒石以志。此井和石碑，是在“老城曹州”复兴动土时被发现后复原，使之得以重光。相传，明代廉吏范希正的范家大院就在此附近，因此这里也成为新建“老城曹州”的一个亮点。

在刘牌坊隅首南，有眼“三山夹一井”。据说是明朝中期，义民刘荣出资在此空旷之地，打了这眼井。一天，有位风先生从井旁走过，说这里风水好，于是有三姓人家在此周边争相建房，结果有三座房屋的山墙从三个方面上把井包围起来，只留有沿街的一面供居民取水，这就有了“三山夹一井”的说法。往东还有个“马道井”，因位于城墙根的马道旁而名。

在城南和城西，因坑塘较多，水源充沛，建有很多作坊井。譬如“酒泉井”，相传酿出来的酒，“色如金，味甘而性醇”，名盛一时，是清代曹州知府杨自钦为此井赐名。还有一个“染坊井”，因周边有多家染布坊而名，城西南的“豆坊井”“粉房井”，也因周边有豆腐坊和粉条坊而名。这些作坊井旁，每天劳作的居民都比较多，有的挑水，有的洗衣，有的淘米，有的洗菜。大家围在一起，一边忙作业，一边唠家常，邻里之情相互交往，构成一幅浓浓的民俗风情画。

老城中的古井，具有浓郁的本地文化景观，是历史场景的见证物，与当地人结下了太多的情缘。有的不知经历了多少沧桑岁月，见证了多少朝代的变迁和动荡，也不知发生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奇。

邓文献

高堂村位于东明县城南25公里，紧靠252省道，南来北往非常便利。据村中老人讲，高堂是千年古村。在明朝宣德元年（公元1426年）高氏祖迁来之前，此地已有秦台村。清朝乾隆版《东明县志》记载：相传秦始皇东去蓬莱寻找长生不老药时，路经此处霾雾四塞，不能前行，遂安营扎寨，宿留古村。

汉朝时，村民在此地筑土为台，以示纪念，遂命名为秦台。高氏祖从河南省陈留县迁来此处，傍台而居取村名为高台。清朝宣统版《东明县志》记为高堂，此后写法和叫法逐渐演变成高堂。

高堂村古老，有老物为证。一是村东二百米处秦台原址犹存，20世纪70年代依然有数十米之高；二是村口有一株古槐，经年累月已经中空，树芯腐烂部分可以容纳一个大人或两个小孩。据传先祖迁来建村时，就有这棵槐树；三是槐下一眼琉璃井，井口用琉璃砌成。以前全村人都吃这口井的水，以致井口的琉璃被井绳磨出多条深沟。

村子老得看不见头，日子远得瞧不到尾。高堂人祖辈辈守着秦台、古槐和老井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与村口闲暇无事的老人攀谈，更是一把将你拽入历史的胡同。风雨沧桑，岁月轮回，高堂村从历史中走来，既风尘仆仆，又充满活力。

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，高堂村人也挨过饿，逃过荒，吃过树皮草根。每人守着不到二亩的沙田薄地，一年到头在饥馑中艰难度日。分田到户后，青沙地经过引黄灌淤，年年丰收，岁岁充盈，村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吃穿不愁后，村民相继盖起了砖瓦房、楼房。部分有头脑的村民买了大功率的农用三轮车做粮食贸易。他们就是去东村的农户买，到西村的粮点上卖，中间赚取差价。可别小瞧了这些粮食商贩，行情好时，一辆车一天可以赚一千多块，就是搁在平时一天也可挣三四百元。所以，高堂村的青壮年一般不出打工，选择从事粮食贩运。只要一农闲，村口三轮车一辆接着一辆往外开，出村时意气风发，回村时兴高采烈。他们拉小麦、玉米，也拉西瓜、花生和蔬菜，只要有钱挣，光明正大，凭力气吃饭。这些年，十里八村只要一提起高堂，都说那是一个运输专业村。

一个村因粮蔬贩运成就了一个产业，带领村子和村民一起变好变富。如今的高堂村几乎家家二层小洋楼，只要家里有年轻人的就有小轿车。富起来的村民集资修路，大街小巷硬化、美化、靓化。绿化果树栽到家门口，夜晚的路灯亮起，村民不再出门一抹黑。

十多年来，高堂村陆陆续续有几十名孩子考上大学，有的还考上了浙江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等名校，不少孩子念到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。这些孩子毕业后，走向了重要的工作岗位。有的孩子出国深造，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，为国争了光，也为村里添了彩。

高贵华



## 穿树叶

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## 刘晏:大唐“人力资源管理专家”(四)

刘晏任职时的另外一个重要功绩是完善了盐业专卖专运制度。由于战乱，州县百姓逃亡，国家的税收受到了严重损坏，国库空虚，加上吐蕃等外族每年都侵犯边境，军需费用开支巨大，以至于到了皇帝率百官和京城所有人员出钱捐助军费的程度。

如何快速增加财政收入，又不给百姓增加负担，刘晏考虑之后，决定从盐业入手。当时，盐业由国家专卖，包括收购和运输都是官府负责，产盐地和各县都设立了盐官，机构臃肿，盐官腐败，盐的销售成本很高，属于现代经济学中的垄断销售。这种情况下，盐价飞涨，一方面民众怨声载道，吃不起盐；另一方面盐的产量和销量都不高，国库收入也不多。刘晏所负责的汴、滑、唐、蔡等州，也就是当时的东南部地区，百姓都吃海盐，同时还在贩卖私盐现象。

刘晏调查后，从改革制度入手，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立盐官，收购盐民生产的海盐，转而销售给私人盐商（盐商必须从官府购盐），然后销售到全国各地，地方管理盐业的官员一概撤销。同时，刘晏对盐民免费发放煮盐器物，扩大产量，吸引盐商来购盐。因为有利可图，盐商购盐积极性也高；盐商多，产生竞争，盐价由市场调整，达到平衡，百姓能吃上盐。这样，裁撤了盐官，减少了支出；官府从商人处获得了利益，百姓也不缺盐吃了。

对偏远地区，为保证百姓吃盐，刘晏要求运送官盐到县里储备起来，遇到盐商不来导致盐价上涨时，就把储备的官盐减价出售，称为常平盐。这样，就减少了官府对盐类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，也让保

障民生用盐成为一个辅助措施，这是一个重大进步。从食盐制度改革上，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入。

建立价格报送制度，是刘晏的又一重大创举。户部是管理天下钱粮的部门，作为户部尚书，刘晏已经有了现代的经济情报思想。为掌握各地的物价信息，他用高价雇佣擅长奔走的人，设立传递价格情报的驿站，每天收集天下各地的粮食、物品价格信息，即便再远，过不几天就会报送到户部。根据各地的物品价格，采取相应平衡物价等经济政策，变通处理，这样，各地的经济状况都在刘晏的掌握之中，对物价上涨或下跌厉害的地区，他就通过商业手段来平抑物价，国家获得了收入而百姓没有了物价忽高忽低的忧虑。通过这种情况报体系，他所作出的决策往往很快就能得到贯彻执行，下属的官员虽然居住在数千里之外，也如同他在眼前指挥一样，没有欺瞒欺骗的。

“民以食为天。”如何保证百姓的吃饭问题，以及出现灾荒后如何赈济也是一个非常挠头的事情。这种情况下，刘晏对“常平法”进行改革，不但完善了赈灾作用，而且，使之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，是一项重大的改革。

“常平法”，从字面来理解，就是平抑物价，保持日常价格的意思。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粮食价格高的时候以低于市场价格抛售粮食；在粮食价格低的时候收购粮食，防止价格高百姓买不起，价格低伤害农民种植积极性。这个制度在战国时期就有了，大唐也不例外，在州县，都设有“常平仓”，用于收购储存粮食。但这也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地

方收购粮食时，收多少粮食、用多少费用都要上报审批；且粮食价格并不是固定的，而是经常变动的；这就给地方官员寻租留下了空间，导致腐败和国家大量资金被浪费。而且，一旦粮食进入常平仓，如果动用，就必须层层上报。古代信息沟通不畅，行政效率低下，如果哪个地方发生灾荒需要赈济，官员需层层上报动用粮食，往往等批复下来，灾荒已经蔓延扩大了。

刘晏看到这个缺陷，于是进行了重大改革。刘晏要求各地把几年来的粮食价格都统计上报，然后把本地的价格列成从高到低几个次等，从低到高对应相应的收购粮食数量。粮食上市后，价格高时，地方官府对应粮食收购区间少收粮食；价格低时，对应区间多收粮食。这样，也赋予了地方人员收购的自主权，即便有一些误差，也控制在了极小的范围内。减少了政策时滞，提高了效率。同样，在粮价高出售后，就多放粮，地方按照这个方法，对照表格执行就可以了，通过平价大量出售粮食，既平抑了物价，也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。在核查的时候也有据可查，避免了“烂账”“糊涂账”发生。

刘晏的这个重大改革在宋代被《梦溪笔谈》的作者沈括学到了精髓，可以从沈括的办理上理解刘晏的措施。沈括所在的北宋，军队的军粮是通过货运司到郡县购买的，因为购买军粮要先统计粮食价格，才能上报审批所用的钱数。然后根据每个地方不同的粮食价格，在粮食便宜的地方多收粮，在价格贵的地方少收粮。但因为交通和通讯的落后，往往等到购粮的公文批复下来的

时候，某个郡县本来便宜的粮价已经上涨了，按照公文规定的价格已经买不到那么多的粮食了。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当中的政策时滞，即外在时滞当中的执行时滞，也就是政策批准后交付有关单位付诸实施所需要的时间。在执行时滞后，宋朝的军粮常常发生高价购买的现象，浪费了财政资金不说，军队也不能保证所需的粮食。

在这个情况下，沈括遇到了和刘晏一样的问题。博览群书的沈括了解了刘晏的办法后，开始采用这个方法。就是让粮食多、交通好的郡县将数十年的粮价和所购粮食数的多少开出单子，把价格开列五个等次上报。粮食刚下来，价格一确定，郡县不用禀报，立即收粮。对照等次，只要是最高第一类价格，就按最高的第五等数收购粮食；如果是最低的第五类价格，就按最高的第一等数收购粮食；第二类按第四等数收购；第四类价就按第二等数收购。收购后，马上将收购数量上报。这样，粮价低的地方收购到的粮食最多，其他地方各自按等级收购到适当的粮食，也不会出现高价购买粮食的现象。

文/图 张长国

## 北宋名相庞籍不是“庞太师”

庞籍还曾是北宋“战神”狄青的上司，正是他力荐狄青平定南方依智高叛乱，才让狄青得了这份大功名。宋朝重文轻武，大将带兵出征，皇帝一般是不放心的，要派一名文官做监军，狄青统帅大军出征时，庞籍建言道：“狄青行伍出身，被文官所轻视，如果被文官掣肘，军令难以统一，如果信任他，为何不让他专任呢？”宋仁宗准奏。狄青果然不负众望，凯旋而归。

庞籍临危护国，战功卓著。在朝言事，铁骨铮铮，从不畏权贵，敢谏直言。宫中女强人章献太后继续留下遗诏，让她妹妹章惠太后继续垂帘听政。庞籍时任殿中侍御史，他严明法度，带头抵制，结果一把火烧掉了宫中垂帘听政的规章制度，扶持已长大成人的皇帝亲政。

庞籍任开封府推官时，宫里的尚贵人自恃受宋仁宗宠爱，派遣内侍假传圣旨，让开封府赦免市场赋税，庞籍何等聪明且刚正之人，岂能骗得了他？命人将尚贵人的亲随痛打一顿，并振振有词：“今后凡是宫中之命，皆不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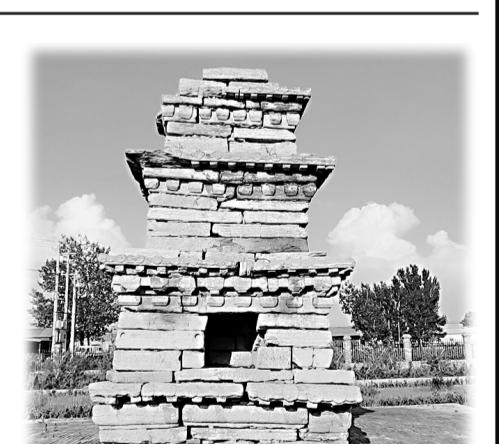
宋朝时，君权与相权相制衡，到了宋仁宗时，相权扩大，皇帝的诏命有时被搁置，君权有被架空的趋势。为大宋江山计，庞籍洋洋洒洒建言献策，劝谏宋仁宗该硬气的时候一定要硬气起来，辨别忠奸，选人用人上要有主见，千万不能被宰相们牵着鼻子走。并站在皇帝一边，与“犯上”的文官们做斗争。他这么做并非巴结皇帝，而是为国家社稷着想。

据宋史记载，庞籍通晓律令，擅长吏事，执法严密，军中有人犯法，或断肢斩首削腹，或多次抽打致死，因此士兵们都害怕而服帖。

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能臣干吏，在一些古戏、评书、公案小说中，却不明不白地成了演义版中的“庞太师”，专干残害忠良、祸国殃民的事，与包拯、杨家将、呼家将斗法，生生把一个令后世垂范的先贤名臣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奸臣。历史上的庞籍从来没有当过大太师，更不是宋仁宗的老丈人。他之所以被后世污名化，从上述来看，推测大致是因他得罪的人太多，皇亲外戚、内官、医生、乐官（反复劝诫宋仁宗减少对他们的赏赐）、文人集团全让他得罪了，加之严刑峻法，落了个酷吏的名声，才被演义成反面人物。

历史有时是面哈哈镜，你看到的、听到的和真相不是一回事。口口相传的民间话本中还有多少被阉割的历史呢？

宋聚新



成武县境内唐代卧塔